

蒙古的獨立自主——拉鐵摩爾的內亞邊地觀點*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

Among the ways to reach men's minds there are logics (the reasoned argument for adventurous individual freedom against the dull conformity of the herd); sentiment (the family, the nation); and association (that of which we are proud because we received it from our ancestors and which we aspire to hand on to our descendants). But there is another way to men's minds, and that is through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y live.

Lattimore (1962a: xxi)

前言

內亞／亞洲內陸（Inner Asia）西起裏海、東抵滿洲、北濱西伯利亞，南邊則橫跨蘇聯未解體前的亞洲邊區，由伊朗、阿富汗、印巴邊界山塊、西藏、綿延到中國長城；就國家的政治疆界而言，內亞的西邊主要是過去蘇聯的諸多中亞加盟共和國，至於南邊，新疆、西藏、及內蒙古（漠南蒙古）則從滿清以來就受制於中國，只有外蒙古（漠北蒙古）是「最老牌的現代衛星國家」（oldest modern satellite），先是帝俄的第一個衛星國家、後來成為蘇聯的衛星國、現在依然與俄羅斯交好；不像過去東歐的衛星國是夾在蘇聯與西方國家之間，外蒙的兩邊是蘇聯及其盟邦中國（Lattimore, 1962b: 165, 501）（圖 1）。



來源：MASU（2020）。

* 發表於台灣國際研究學會主辦「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蒙古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大夏館 903 會議室，2020/10/17。

圖 1：內亞的範圍

蒙古人／蒙古族（Mongols, Mongolians, Mongolian people）屬於阿爾泰語系（Altaic languages），後者包含蒙古語族（Mongolic languages）、突厥語族（Turkic languages）、及通古斯語族（Tungusic languages）；當下，世界上的蒙古語族有 7,500,000 人，其中又以講蒙古語（Mongolian language）者為核心，總共有 5,900,000 人¹，主要分布在蒙古國（2,400,000）、以及中國（3,500,000，特別是內蒙古自治區）（Gutman & Avanzati, 2013a, 2013b, 2013c）（圖 2）。就外觀上，拉鐵摩爾認為鼻子高聳的蒙古人很像美國的印第安人（Lattimore, 1962a: 1）



來源：Gutman & Avanzat（2013b）。

圖 2：蒙古語族的分布

就中國的歷史記載來看，蒙古屬於北狄的東胡，歷經鮮卑（147-234）、柔然（330-555）、及室韋（6-12 世紀），後來在明朝（1368-1644）分為韃靼及瓦剌東西兩大支，清朝（1616-1912）則先後征服、劃為內蒙古及外蒙古；就蒙古人自己的政權而言，由鐵木真（成吉思汗）在 1206 年建立大蒙古國／蒙古帝國²（1206-1368），歷經北元（1368-88）、大蒙古國／博克多汗國（1911-19, 1921-24）、蒙古人民共和國（1924-92）、到蒙古國（1992-）（維基百科，2020：蒙古歷史；

¹ Wikipedia（2020: Mongols）所提供的人數比較多，總人數是 10,000,000-11,000,000 人（2016），其中，中國 6,146,730 人、蒙古 3,201,377 人、俄羅斯 822,763 人、韓國 41,500 人。

² 蒙古帝國第四代大汗蒙哥在 1259 年逝世，其弟忽必烈接任第五代大汗，消滅中國南宋、建立大元蒙古國／元朝（1271-1368）。

Wikipedia, 2020: History of Mongolia) (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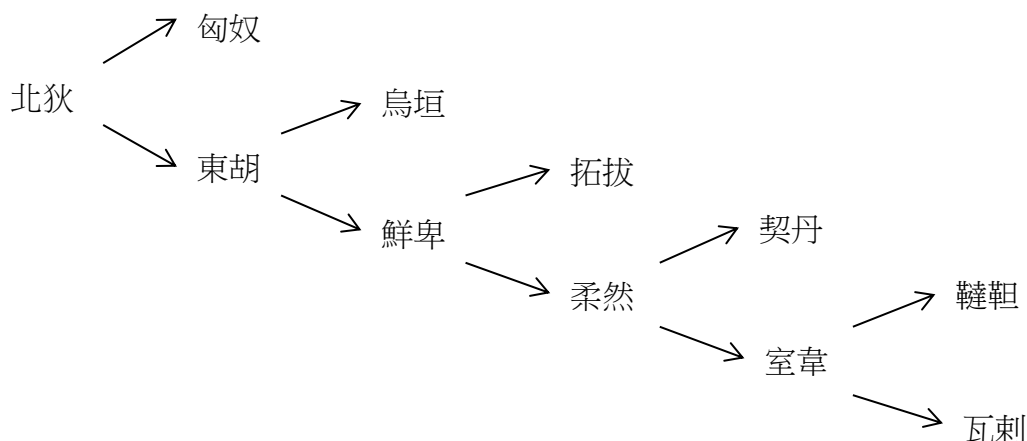


圖 3：中國歷史中的蒙古

滿清分別在 1636、1694 年征服蒙古南北部，大致上就是內、外蒙古(圖 4)。中國在 1911 年 10 月爆發革命，外蒙在年底宣佈獨立、建立政教合一的大蒙古國(博克多汗國)。俄羅斯立場曖昧，既不支持蒙古獨立、也反對中國加以「收回」；俄國在 1915 年與中國(袁世凱政府)簽訂『中俄蒙協約』(又稱為『恰克圖條約』)，俄國承認法理上蒙古是中國的藩屬，中國則實質上接受外蒙古自治。俄國在 1917 年爆發革命，中國(北洋皖系徐世昌政府)在 1919 年派遣徐樹錚進軍外蒙古、佔領庫倫，撤銷自治。蘇維埃俄國(1917-22)在 1918 年陷入內戰(1918-20)，俄國白軍、及紅軍先後在 1920、1921 年攻入外蒙。在 1924 年，蒙古人民黨領導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西方國家並不承認；國民政府在 1928 年北伐成功，外蒙古被列為蒙古地方。日本先在 1931 年入侵滿洲、扶植滿洲國(1932-45)，又在 1935-36 年揮軍內蒙古、扶植蒙疆聯合自治政府³(1939-45)。日本投降之際，中國與蘇聯在 1945 年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同意外蒙古舉行公民投票；公投結果顯示 97% 外蒙人支持獨立，國民政府在 1946 年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一直到 1953 年，已經撤退台灣的蔣介石中華民國政府才廢約，誓言不放棄對外

³ 來改名為蒙古自治邦(1941-45)，結合蒙古聯盟自治政府(1937-39)、晉北自治政府(1937-39)、及察南自治政府(1937-39)，而前者的前身是蒙古軍政府(1936-37)，都是日本的傀儡政權。

蒙古的主權。中華民國在 1955、1956 年否決外蒙古加入聯合國，最後在美國的壓力下放棄在安理會的杯葛，蒙古人民共和國 1961 年終於成為聯合國會員。⁴



來源：Wikimedia Commons (2020: File:Qing Empire circa 1820 EN.svg)。

圖 4：滿清中國的版圖擴張

中華民國承襲清朝的行政區劃設置了 22 省⁵，北洋政府增設熱河、察哈爾、綏遠、及川邊等 4 個特別行政區（內蒙古劃為前 3 特區），再加上蒙古（約略外蒙古）、西藏、青海、以及京兆等 4 個地方；國民政府在 1928 年將熱河、察哈爾、綏遠、以及青海改制為省，川邊特別區改設西康省，另外增設寧夏省，總計 28 省，內蒙古被拆解為黑龍江、吉林、遼寧、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及甘肅等 8 省（維基百科，2020：中華民國行政區劃）。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1949 年建制後，先後撤銷察哈爾（1952）、綏遠（1954）、寧夏（1954）、及熱河（1955）等省，設置內蒙古自治區（維基百科，2020：內蒙古自治區）。

⁴ 這一部分，主要整理自 Friters (1949)、Rossabi (1975)、Sanjdorj (1980)、Bawden (1989)、及 Liu (1999, 2006)。

⁵ 直隸、奉天（遼寧的舊稱）、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山西、江蘇、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陝西、甘肅、新疆、四川、廣東、廣西、雲南、及貴州。

在這裡，我們先將介紹拉鐵摩爾的生平，再來整理他對於邊疆地方、邊疆的擴張、以及地緣政治下的亞洲內陸的觀點，接著嘗試觀察他對於蒙古的民族主義、及徬徨於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內蒙古的看法，最後理解他對於外蒙古在國際上的大戰略、以及衛星國家地位選擇的評價。

拉鐵摩爾的生平

拉鐵摩爾在 1925 年首度前往內蒙古，跟從事駱駝商隊的蒙古、及新疆貿易商談過，當下決心辭掉工作深入內亞；次年，夫婦兩人從中國出發、經過西藏、前往印度，輕車簡從，沒有什麼行李，隨身攜帶的幾本書就是斯坦因(M. Aurel Stein)的《中國沙漠遺跡》(*Ruins of Desert Cathay: 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1912)、亨廷頓(Ellsworth Huntington)的《亞洲脈搏》(*The Pulse of Asia: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Illustrating the Geographic Basis of History*, 1907)、卡魯瑟斯(Douglas Carruthers)的《未知的蒙古》(*Unknown Mongolia*, 1913)、玉爾(Henry Yule)翻譯的《馬可·波羅遊記》(*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1921)、蕭爾(Robert Shaw)的《造訪高地韃靼》(*Visits to High Tartary, Yârkand, and Kâshgar (formerly Chinese Tartary): And Return Journey Over the Karakoram Pass*, 1871)、以及赫定(Sven Hedin)的《跨喜馬拉雅》(*Trans-Himalaya: Discoveries and Adventures in Tibet*, 1909)，此後，他對於歷史、及地理就維持廣泛的興趣，特別是諸多內亞民族多采多姿的生活方式(Lattimore, 1962c: lv)(圖 5)。



來源：Lattimore (1962b (1944): 120)。

圖 5：中國與邊疆正投影

拉鐵摩爾在 1928 年返回美國後，因為《通往土耳其斯坦的沙漠之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1928) 獲得社會科學研究會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的補助，到哈佛大學接受人類學訓練 8 個月，接著於 1929 年在美國地理學會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的贊助下，前往中國的長城 [塞外] 邊疆 (Great Wall Frontier of China)，包括滿洲、蒙古、及新疆，此時，他對於中國的內亞邊疆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已經有初步的理解。在 1930 年，夫婦兩獲得哈佛燕京學社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以及古根海姆基金會 (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 的贊助，由滿洲搬到北平，又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的支助下，每年在一名蒙古嚮導的陪同下騎著駱駝探訪蒙古一次 (Lattimore, 1962c: lvi)。⁶

在 1930 年，拉鐵摩爾出版了《高地韃靼》(*High Tartary*)，夫人埃莉諾·霍爾蓋特·拉鐵摩爾 (Eleanor Holgate Lattimore) 在 1934 年出版《土耳其斯坦會合》(*Turkestan Reunion*)，他在 1975 年的版本寫了一篇長序。他先後在 1932、1934 年出版《滿洲——衝突的搖籃》(*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及《滿洲的蒙

⁶ 有關於拉鐵摩爾的一般性介紹，見 School of Languages, Cultures and Societies, University of Leeds (2020a, 2020b)、Wikipedia (2020: Owen Lattimore)、及維基百科 (2020：歐文·拉鐵摩爾)，評價見 Grey (1953)、Hansen (1956)、Newman (1992)。

古人》(*The Mongols of Manchuria*)，描繪了該地漢人與蒙古人的關係。在 1933 年，他回美國受聘擔任《太平洋事務》(*Pacific Affairs*) 的編輯，同時在太平洋國際學會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的支助下，準備《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⁷》(*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1940) 的素材，6 年當中，有一半的時間住在北平，因此可以不時造訪華北、及蒙古；由於中日戰爭在 1937 年爆發，夫婦兩人於年底返回美國，開始撰寫《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並獲得美國地理學會會長、後來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鮑曼 (Isaiah Bowman) 聘到佩吉國際關係學院 (Walter Hines Pag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ttimore, 1962c: lvii)。

在 1940 年出版《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後，拉鐵摩爾旋又寫了《蒙古之旅》(*Mongol Journeys*, 1941)。日後，他又延伸《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出版了《亞洲的樞紐——新疆與中國及俄羅斯在內亞的邊疆》(*Pivot of Asia: Sinki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1950a)、以及《游牧民族及政委——重返蒙古》(*Nomads and Commissars: Mongolia Revisited*, 1962)。

拉鐵摩爾在 1962 年蒐集自己在 1928-58 年之間的論文、或是演講稿，出版了專書《邊疆歷史研究——1928-1958 年文選》(*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他分為內亞邊疆、新疆、蒙古、滿洲與中國、少數民族、及社會史六大項目；根據他自己在序言所述，這本選集容或有重複的地方，不過，還是依據新的材料有所發展、或是修正 (Lattimore, 1962b: 11)。James Cotton (1989) 的《亞洲邊疆民族主義——歐文·拉鐵摩爾與美國的政策辯論》(*Asian Frontier Nationalism: Owen Lattimore and the American Policy Debate*)，將拉鐵摩爾的研究分為邊疆觀點、邊疆社會與蒙古民族主義、內亞邊疆、地緣政治及外交政策、被審判的意見、及蒙古文明的過去及現在等七大部分，集中在邊疆、及蒙古。耶魯大學歷史學者濮德培 (Peter C. Perdue, 2018) 在牛津線上手冊 (*Oxford Handbooks Online*)，把拉鐵摩爾列為世界史學者 (world historian)，將他的研究分為邊疆、

⁷ 1940 年的原版、及 1951 年第二版由美國地理學會出版，本文使用的是 Beacon Press 的版本 (Lattimore, 1962c)。

地緣政治分析、以及環境決定論與歷史方法論。

拉鐵摩爾原本是以地緣政治(geopolitics)、或是政治地理(political geography)的觀點,來考察中國從秦朝到現代與邊疆的定位,特別是在甲午戰爭(1894-95)、及日俄戰爭(1904-1905)之後,中國除了要面對列強 19 世紀以來沿海瓜分勢力範圍,還必須隱忍日本人、以及俄羅斯人在塞外及關外透過鐵路興建的競逐;蔣介石領導北伐(1926-28)成功、統一中國以後,國民政府不再拘泥於傳統的漢化政策,在蒙古、及滿洲展開反制,尤其是在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1931)、扶植滿洲國(1932),這時候,拉鐵摩爾開始注意到邊疆民族自己的觀點(Cotton, 1989: 6-7)。在 1950 年,飽受麥卡錫主義之苦的拉鐵摩爾出版《誹謗的考驗》(*Ordeal by Slander*, 1950b),描寫被迫害的心路歷程。

邊疆地方

拉鐵摩爾的邊疆觀點,最早是在 1940 年出版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初試啼聲,他把焦點放在中國長城以外的邊陲領地(marginal territories),也就是從太平洋岸到帕米爾高原的滿洲、蒙古、新疆、以及西藏,漢人自古用來阻絕異族、屏障中國本土⁸(China proper);然而,不像中國傳統的擴張是由北到南、由西到東,現代中國對於內陸邊疆從事驚人的移民、及征服,尤其是內蒙古、及滿洲,漢人有如洪水般蜂擁而至,宛如美國在土地授予政策(land grant policies)下的西部擴張(Lattimore, 1962c: 3, 12-15, 21)。

拉鐵摩爾認為,相較於長城在形式上是一條明顯而絕對的線性邊界⁹(frontier line),也就是邊線,塞外陸地則是一束條帶狀的邊區(frontier zone)(Lattimore, 1962c: 3, 21; 1962b: 165-66)。他在 1952 年於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宣讀〈內亞的新政治地理〉(*The New Political Geography of Inner Asia*),次年刊載於《地理學報》(*Geographical Journal*)。拉鐵摩爾首先以住在法國與德國交界的邊疆居民

⁸ 又稱為中國本部、關內、內地、漢地、漢境、漢疆、十八行省、內地十八省、九州。

⁹ 至於滿州的長城,明朝稱為邊牆(Chinese Pale)、清朝稱為柳條邊(Willow Palisade),蒙古人在西及西北部、滿州人在東及東北部(Lattimore, 1962c: 247)。

(frontier people, borderer, marchman, *grenzleute*) 為例，相較於兩邊往內逐漸延伸的標準法國人 (standard Frenchmen)、還是標準德國人 (standard Germans)，他們不論是語言使用、住屋類型、還是耕作方式，呈現出法國性 (Frenchness)、以及德國性 (Germanness) 混合的極大化 (Lattimore, 1962b: 166)。

接著，拉鐵摩爾比較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蒙古邊區，這是比較複雜的多重分區 (multiple zoning)：旅遊者一旦進入內蒙古、將標準漢人拋在腦後，迎面而來的漢人墾民 (Chinese colonist)，從他們身上可以開始看到一些蒙古的風味；繼續往前走，那是漢蒙混合達到極大化的地帶；接著再深入，就可以看到蒙古日常生活特色的影響越來越強；最後到達外蒙古，那是全然的蒙古性 (Mongolness)，已經完全拋開中國的一切、卻又尚未邂逅任何俄羅斯的東西，在這裡，中國、及俄羅斯的影響極小化；等到進入布里亞特蒙古 (Buryat Mongolia)，開始可以感受到俄羅斯的影響，接著是蒙俄混合極大化的地帶，然後是蒙古的影響逐漸減少，最後終於達到全然俄羅斯的境界 (Lattimore, 1962b: 166, 168) (圖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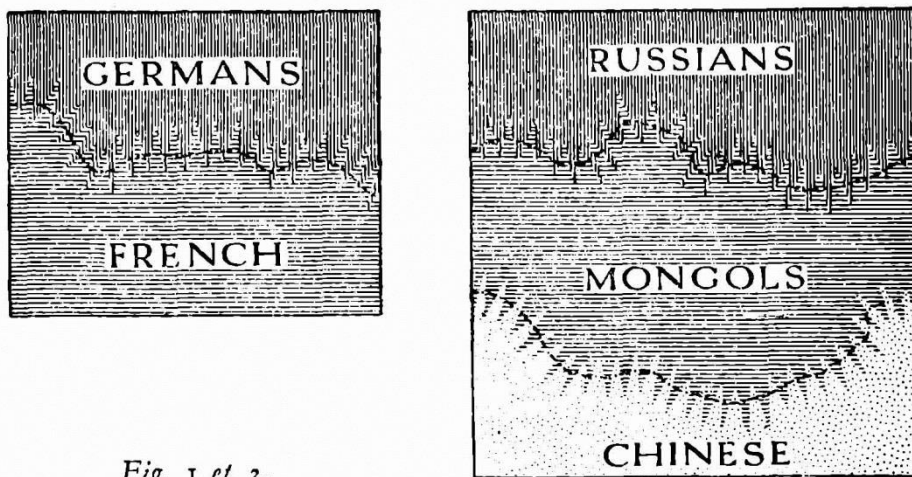


Fig. 1 et 2.

來源：Lattimore (1962b (1952): 165)。

圖 6：邊界與邊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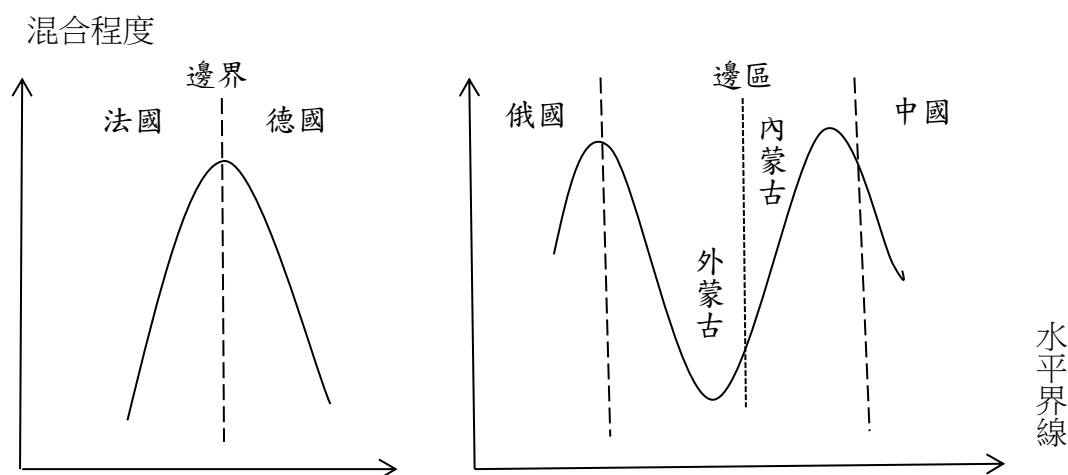


圖 7：法德邊界及俄中邊區

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指出，塞外的邊疆又分為外疆（outer frontier zone）、及內疆（inner frontier zone），譬如外蒙古、及內蒙古之別，外疆大草原上邊遠牧人（outlying nomads）過的是純粹的遊牧生活方式，而內疆的牧人（border nomads）則是時而游牧、時而農業，左顧外延的族人、右盼塞內的邊境漢人（border Chinese）：異族的侵略通常由內疆發動，當他們征服中國建立王國、甚至於帝國之後，往往只有局部人馬入主中國本部，局部留守長城界外，一方面可以扮演後衛（rear guard）的角色、防止外疆冥頑不靈的部落趁虛而入，另一方面則儼然是人才的儲備處（reservoir），出身內疆的邊民可以到內地當官、或是駐軍，因此，內疆攸關華北的安危、甚至於中國的主權；相對地，邊遠的外疆通常並未參與征服中國的作戰，除非是能結合內疆的族人，而中國的帝國擴張一般也不太願意嘗試整合那些馳騁草原的游牧民族，只有在盛世時期，政治控制、及文化影響或可達到極致；至於邊境的漢人，有時候會被主動、或是在國家力量下往北延伸農業，有時候也有可能是游牧首領的號召下大膽往北發展，嫁接漢人的政治勢力（Lattimore, 1962c: 247-51）。

拉鐵摩爾進一步解析疆民的政治認同，發現有些人容或會表現出較強的忠誠度，然而大體而言，一般人的集體行為傾向往往展現模稜兩可忠誠度，也就是倒向勝利的那一方；特別是就內亞的疆民而言，由於是在俄國與中國之間的夾心餅乾，兩邊的主要族群、或民族並非自己的族人，這時候，就有所謂的「邊疆治理

的道理」(axiom of frontier administration)，也就是面對實力相當的兩個強權，由於親屬關係不是那麼重要，首鼠兩端，真正要考量的是軍事力量、階級利益、或是個人仕途的機會 (Lattimore, 1962b: 166-68)。

邊疆的擴張

拉鐵摩爾在 1947 年於《經濟史學報》(*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發表了一篇論文〈亞洲內陸邊疆——中國與俄國的邊緣擴張〉(Inner Asian Frontiers: Chinese and Russian Margins of Expansions)，首度提到美國歷史學家特納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996) 的邊疆理論，比較分析美國、俄國、及中國領土擴張的方式，也就是位移 (displacement)、納入 (incorporation)、及吸納／變性／轉換 (absorption, transformation, conversion) (Lattimore, 1962b: 134, 154, 157)。在 1953 年的〈內亞的新政治地理〉，拉鐵摩爾除了比較中國的領土吸納、及俄國的領土納入，還提出英國車軸般的帝國累積 (accumulation) 模式 (Lattimore, 1962b: 170-74)。在 1957 年，拉鐵摩爾於美國歷史學會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發表〈亞洲內陸邊疆——防衛性及征服式擴張〉(Inner Asian Frontiers: Defensive and Conquest Empires)，進一步有更完整的闡述。

首先，他認為美國橫貫北美洲大陸、由大西洋岸到太平洋案的殖民開發，本質上不只是一種剝削、而是通盤的人口置換，印第安人最後在政治上淪為受監護者 (ward)、在經濟上變成倚賴的窮光蛋；他語重心長地表示，回顧人類在歐亞大陸之間的遷徙、或是征服，儘管潮起潮落，像這種作法史所未見，連成吉思汗的屠殺、或是帖木兒都小巫見大巫 (Lattimore, 1962b: 136-37)。

接著，俄國幾百年以來所採取的是納入模式，這是一種雙重的結合 (double merging)，征服者為了方便統治，不管語言、宗教、或是文化的差異，通常不會完全被消滅投降的被征服者統治階層，而是想辦法把這些草原的首領納為低層、甚至於提升為中層貴族，連其家人都可以接受俄國教育，以減弱他們領導族人反

抗俄羅斯的誘因，而這些頭人也會選擇適在當的時機接受收編、免得一無所有，同樣地，征服者的平民往往也樂於學習對方的語言、及生活方式，甚至於跟被征服者的老百姓結合¹⁰；只不過，俄國自來把投資放在西伯利亞、在他處無力與日本競爭，因此，在 1944 年併吞唐努烏梁海以後就開始卻步，主要是認為再往前就不值了¹¹（Lattimore, 1962b: 137, 172-73, 511-12; 1962a: 11-13）。

再者，中國歷史上對於邊疆的吸納，有點像墨水在宣紙上面散開來，也就是在征戰速戰速決後，比較偏重對於夷狄的教化，只要他們願意學習漢人食衣住農方式、講漢語，就算是正常的標準漢人，宛如大海鹽漬百川一樣，連日本人入侵中國的理由之一是，「反正日本人在百年內會被中國吸納」；在南方、及西南方，如果非漢人不願意跟漢人接觸而往山丘遷徙，漢人就順勢滲透進佔平地，否則，要是前者表示友好而留下來，彼此就相安無事，雙方透過頭人、及通事互相往來；至於北方草原，除了語言、及服飾的同化，更重要的是透過水利設施的發展，誘導游牧民族由牧業的粗放經濟（*extensive economy*）走向農業的集約經濟（*intensive economy*），直到經濟報酬遞減（*diminishing economic returns*）為止；因此，邊疆地區是游牧民族與農業社會共生、混合的社會（*mixed society*），一方面，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可以吸納漢人文化而轉換，包括蒙古、突厥、波斯、及阿拉伯人，連後來居上的滿洲人，在征服中國之前就已經相當漢化，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漢人經過超脫（*detached*）變成牧人，只不過，大體還是前者多於後者（Lattimore, 1962b: 137-38, 143, 147, 153, 331-34, 510-11）。

然而，進入 19 世紀，由於中國在內蒙古架設鐵路、加上武器比較精良，大量移入的漢人農民不再轉換為牧人、而滿清政府也不再耐心等待牧人轉換為農民，

¹⁰ 事實是，不管上下階層，都可以看到跨族的通婚，換句話說，階級政治甚於種族偏見，也因此，俄國大革命爆發的時候，俄羅斯人與非俄羅斯人的分歧並沒有權貴與百姓之間的矛盾嚴重；換句話說，帝俄在內亞的挫敗，並非當地的老百姓起義對抗俄羅斯人，而是反對自己的上層階級，因此比較同情蔓延的俄羅斯革命、或者至少不想有瓜葛，相對地，當地的權貴則比較認同帝俄（Lattimore, 1962b: 172, 511-12）。

¹¹ 相較於日本、德國、及義大利在 1930 年代的擴張往往振振有詞，特別是抒解本身過多的人口因此，俄國認為只要能控制就好，譬如蒙古、或芬蘭，不一定會採取領土擴張的途徑；因此，即使中國在 1911 年勢衰，俄國也沒有想要併吞蒙古（Lattimore, 1955: 43; 1962a: 12）。

流離失所的蒙古人，不免敵視漢人，自然強化他們萌芽中的現代民族主義思維（Lattimore, 1962b: 155, 170）。整體而言，拉鐵摩爾認為，中國在南方、及西南方的吸納比較成功，也就是採取一種加速的演化（accelerated evolution），至少當地人只是「尚未變成漢人」（not yet Chinese），不像在內亞，經濟上的改弦更張不是很順利，要牧人放棄粗放經濟不是易事，對於那些「非漢民族（no-Chinese peoples）只好採取間接統治，特別是蒙古、及西藏；至於新疆的綠洲，城鎮、以及周邊鄉下則是特例，中國政府得以任命漢人採取直接管理（Lattimore, 1962b: 170-71）。

至於英國的累積擴張方式，主要是充分發揮海權的優勢，由港口逐步往內陸滲透，再透過國際貿易連結到倫敦；儘管海運相對便宜，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必須考慮將原料、半成品、或加工品運到海港的成本，才能有助於英國工業效率的提升；也因為這樣的盤算，一旦擴張到近山地區，經濟的臨界點與戰略邊陲不謀而合，英國就顯得意興闌珊，因此，帕米爾高原或許可以當作英軍、或是印度軍隊的訓練場所，如果真的必須動用軍隊捍衛，所費不貲，這也是為什麼英國寧願讓西藏成為印度與中國之間的緩衝地；基本上，這是新型的帝國主義，英國在殖民地只派遣少數的軍隊、行政人員、商人、銀行家、以及工廠老闆，這些人把小孩送回英國接受教育、學成以後再回到殖民地繼承父職，可見英國人並不打算吸納當地人，而是彼此保持一定的距離，通婚不是常態；總之，這是以英國為樞紐的輻射狀關係，有點像是車輪的樣子，每個屬地跟中心軸直接相連、屬地之間的聯繫不太重要，因此，邊陲與中心的經濟整合實質上就是被壓到最底層（Lattimore, 1962b: 173-74, 509-10）。

由於內亞並竟並非無人之地，面對支配的游牧民族，可以有怎麼樣的選擇，特別是介於俄羅斯、以及中國之間的蒙古人，到底要接受支配、還是尋求結合（association）或者結盟（alliance）？拉鐵摩爾指出，蒙古人幾百年來的傳統作法是抗拒中國的吸納，在帝俄時代選擇被俄羅斯納入，即使俄國大革命以後，三權相害取其輕，與其接受中國的移民政策而流離失所、或是被日本征服，倒不如

跟蘇聯結合、甚至於結盟；因此，儘管外蒙古因為與蘇聯的同盟關係，在日本入侵時有所傷亡，畢竟可以獲得較好的條件來共同利用資源，拉鐵摩爾甚至於認為，彼此的互利關係宛如關稅同盟，有幾分像是羅斯福總統所揭櫫的睦鄰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Lattimore, 1962b: 157-59）。

地緣政治下的亞洲內陸

拉鐵摩爾以為，自古以來，人類的歷史分分合合，不外排除（exclusion）、就是納入（inclusion），斤斤計較的是收益是否大於成本，因此，古老的文明為了要防止蠻族的入侵，最好的方式不外實邊、以及禁出：在西邊，希臘人的墾殖止於黑海，而羅馬人則沿著多瑙河、萊茵河、及英格蘭與蘇格蘭的界線構築長城（limes），南邊由大西洋到太平洋是灌溉的精緻農業，往北是林地，從事粗耕農業、畜牧、及狩獵的混合經濟，再往北則是中東、及內亞的草原及沙漠（Lattimore, 1962b: 504; 1962a: 12）。

拉鐵摩爾認為，作為北疆的內亞不只是文明與野蠻的界線，而是古老文明擴張所創造出來的，也就是說，當文明人尋求新的土地之際，他們會吸納一部分的當地人、然後驅逐其他的人，因此，其實是逼迫人家放棄既有的演化，進而創造出本身所畏懼的野蠻血腥瘟疫；總之，就內亞的社會史並非野蠻民族本身經過深思熟慮往南進攻寫出來的，而是他們面對文明國家之際所嘗試的自我調適；特別是對於蒙古人的演化而言，面對入侵及出征的相互交替，本身必須不斷地從事內外的調適、及權力的轉移（Lattimore, 1962b: 504-506）。

拉鐵摩爾指出，在一次大戰爆發之前的半個世紀，強權透過鐵路的架設深入原本不可及的內陸，主要是開採原料，運用廉價的海運到西方工中心，然而，鐵路架設給俄國、英國、及中國帶來沈重的財政壓力，特別是臨界經濟報酬遞減，入不敷出，俄國及中國轉而將重點放在就地開發；自從俄羅斯人在 19 世紀完全征服中亞後，內亞邊界情勢因為均勢平衡而已經大致上穩定，特別是進入 20 世

紀，俄國在日俄戰爭挫敗，跟英國分別取得伊朗、及阿富汗北南的勢力範圍，而中國在革命後則陷於新疆的泥淖，西藏表面上是中國自治區，俄羅斯及英國既不願意併吞、也不願乾脆放手獨立，而是聽任跟中國周旋；同樣地，俄羅斯敗給日本後連續簽定了幾個密約¹²，分別將外蒙古、以及滿洲納為囊中之物（Lattimore, 1962b: 168-69; 1962a: 12-13, 51）。

戰爭結束後，由於英國退出印度、及巴基斯坦，其阿富汗政策已經無傷大雅，因此，從黑海到黃海，西方強權在內亞無足輕重，只剩下蘇聯、及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瓜分地盤；中國師法俄羅斯的傳統作法，不再大費周章著手過時的漢化工作，譬如允許小學教育使用當地的族語、並不堅持漢語受教，而且又拔擢被支配民族的菁英加入統治階層、不擔心權力被稀釋，因此，有志更上一層樓的聰明人當然了然於胸，不管是要毛遂自薦加入共產黨、或是從事科技，漢語是仕途順遂的不二法門，儘管這樣子的安排在先天上對族人整體而言是不利的（Lattimore, 1962b: 512-13）。總之，拉鐵摩爾以為二次大戰前的穩定是被動的、均衡是靜態的，至於戰後的穩定是積極的、平衡則是動態的（Lattimore, 1962b: 501-502）。

蒙古的民族主義

解釋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產生的理論，基本上可以歸納為三大類：原生論（primordialism）認為民族認同建立在體質、或是文化上不可磨滅的差異，而結構論（structuralism）以為民族認同的出現是因為在政治、經濟、社會、或是文化上的不平等，至於建構論（constructuralism）則主張民族認同是一種共同體（community）的建構；對於持原生論者來說，認同的核心是原生的本質（essence），結構論者強調的則是由過去到現在的共同的經驗、及集體的記憶，尤其是負面的屈辱，而建構論者所揭櫫的是對於未來的想像。一般又有族群式

¹² 在日俄戰爭結束到俄國大革命爆發之間，俄國與日本先後在 1907、1909、1912、及 1916 年簽訂密約，兩者確立各自的勢力範圍，特別是一次世界大戰（1914-18）爆發，日本專注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不願意節外生枝，對於內蒙提供武器的要求還不敢明目張膽（Friters, 1949: 217-26）。

(ethnic nationalism)、以及公民主義 (civic nationalism) 民族主義的二分法，進而規範上以為前者是排他的 (exclusive) 而大加撻伐、後者是包容的 (inclusive) 而讚譽有加。

傳統上對於中國人意識 (Chinese consciousness) 的想像，大體是建立在華夷之辨，簡而言之，就是內亞草原游牧民族對於中國的威脅，具體而言就是匈奴、蒙古人、及滿洲人主中原；因此，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 (Chinese nationalism) 原本是漢人的民族主義 (Han nationalism)，所倡議「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充滿了原生論、及結構論色彩，表面上的浪漫主暗藏底層的種族主義，說中性一點是「文明衝突」，說穿了不免對於異族他者妖魔化一般；儘管後來的建構改弦更張為所謂的「大民族主義」，宣示「五族共和」、「民族團結」，然而，不管是中華民國 (Republic of China)、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幾乎是同一個模子刻出來，這裡所謂的「中華」，「中」是中土、或是中原，而「華」其實就是漢，至於英文就沒有那麼隱晦，掩飾不了「中國」就是「漢人¹³國家」的本質 (Bulag, 2002: 3-18)。

針對蒙古民族主義的發展，拉鐵摩爾在 1936 年發表了兩篇論文，〈內蒙古民族主義黯然失色〉(The Eclipse of Inner Mongolian Nationalism)、及〈內蒙古民族主義的歷史背景〉(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Inner Mongolian Nationalism)。他主張，儘管蒙古民族主義的政治表徵始於滿清亡於 1911 年，不過，還是有必要瞭解其歷史背景：蒙古人所建立的窩闊台汗國(1225-1309 年)、伊兒汗國(1256-1335)、察合台汗國 (1222-1369)、及北元 (1368-88)，在 14 世紀相繼滅亡，族人四分五裂、部落之間彼此交戰不已，直到 17 世紀與滿洲人結盟、作為側翼征服中國；到了 19 世紀末，由於新式武器的引入、及西方強權由海上前來，蒙古人的軍事輔助用途大為降低，傳統的羈縻分治作法可有可無，加上王公因為有固定的領地而淪為地主，又無力對抗那些邊省擁兵自重的漢人軍閥，只能眼睜睜見鐵路載來一批又批的漢人墾民，特別是在內蒙古；這種「墾殖式的征服」(conquest by

¹³ 不要忘了，「漢」就是「人」，所以，弦外之音是「非漢」等於「非人」。

colonization) 混合著軍事征服、政治支配、社會裂解、及經濟剝削，造成蒙漢之間的相互敵視，這就是內蒙古民族主義萌芽的背景 (Lattimore, 1962b: 441-46)。

相對之下，由於天高皇帝遠，外蒙古的族人大致上得以維持原來的游牧方式，社會、及經濟結構比較沒有遭到扭曲，政治上也比較沒有被中國支配，因此，眼見滿清政府垮台，既然原本與中國就沒有瓜葛，立即義正辭嚴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只不過，由於俄羅斯不願意得罪其他西方強權，因此，只要中國不要妄想染指，就可以出面約束外蒙古稍安勿躁，所以在 1911-17 年間，這裡的時間幾乎是停止的，沒有重大的變革；在 1915 年，由俄國出面斡旋中、蒙雙方，中國接受蒙古的實質獨立、俄國承認中國擁有蒙古的主權，也就是說，三方各取所需，中國可以保有自己的門面，蒙古人感覺到已經獲得獨立了，而俄國則在實質上擁有勢力範圍；總之，由於俄國心不在外蒙古，不像中國對於內蒙古傳統生活造成嚴重的破壞，沒有立即的社會、或是經濟改革壓力 (Lattimore, 1962b: 446-48)。

所以，拉鐵摩爾認為蒙古民族主義的積極發展，其實是在內蒙古：由於蒙古人在心理上以為當下的社會及經濟變遷有利於漢人，因此推斷，只要能夠在政治上獲得獨立、或者自治，對於保守的民族主義者而言，至少可以遏止這樣的惡性循環，而自由式民族主義者則相信政治革命有助於族人；自始，民族主義的領導者主要來自王公之下的「台吉」，儘管他們是成吉思汗、或是其兄弟的後代，然而畢竟不是王公統治階層，所以並沒有收買的價值，他們所領導的起義往往面對無情的鎮壓，相當地無奈；對於漢人軍閥、或是地主而言，軟硬兼施，蒙古王公、或喇嘛輕易就範 (Lattimore, 1962b: 448-49)。

漸漸地，內蒙古民族主義發展出兩條路線：保守派主張民族解放，以為只要能提高王公的地位、能夠跟軍閥平起平坐就好，激進派則認為必須改革王公權力世襲的制度，否則老百姓不能有真正的自由；不過，由於不斷地挫敗，這些絕望而缺乏自信的菁英瀰漫失敗主義，有些人擔心報復逃逸外蒙古，在俄國的監督下只能乖乖地傳播理念，一些人則寄望中國能本著被壓迫者的同理心，或許有可能會支持蒙古解放、或是至少許諾自治，因此主張親中，另外一些反中派則一廂情

願，認為只要日本進軍滿洲、或是華北，就可以間接紓解中國對於蒙古的壓力，因此力主跟日本結盟、自動請纓擔任側翼（Lattimore, 1962b: 449-52）。

拉鐵摩爾認為，相較於外蒙古，內蒙古既然放棄主動尋覓自我力量的努力、只會無助地寄望外力的介入，不管是透過日本在滿洲國獲得自治，或是想辦法跟南京國民政府妥協獲得近似於省的地位，也不過是臣服式的民族主義（*subservient nationalism*）罷了，儘管沒有明言，聽起來卻是嗤之以鼻；另外，他進一步主張除非蒙古的政治革命能夠伴隨經濟、及社會革命，否則那些老式的民族主義再怎麼浪漫，只要壓榨的本質沒有改變，都是虛幻（*illusionary*）、虛無（*unreal*）、而假性（*pseudo*）（Lattimore, 1962b: 452-54）。對他來說，不論是政治壓迫、還是經濟壓榨，都有內外兩個層面，光專注於外國的政治壓迫、爭取獨立是不夠的。

如果以時下對於民族認同產生的三種觀點來看，拉鐵摩爾應該會認為原生論是不夠的，也就是光強調民族差異，即使能獲得名目上的政治獨立，並不能解決內部的政治權力、經濟資源、社會地位、甚至於文化認同的合理分配，所以，他應該會比較傾向於同意結構論的看法；至若於這些改革究竟是有優先順序（先政後社經），還是應該同步進行，或至少主張不可脫鉤。除了強調民族主義的社會經濟面向，拉鐵摩爾的貢獻是指出這不是單純的民族垂直分工，而是兩邊各自的政治威權體制、及社會封建結構，分別宰制族人的經濟剝削。

徬徨於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內蒙古

拉鐵摩爾指出，對於立意在亞洲大陸建立帝國的日本來說，磨磨蹭蹭已久的韓國只是門檻，而滿洲則是大門，所以，當日本在 1931 年征服滿洲以後，既然強力登堂入室，接下來就有三條道路可以走，包括蘇聯在西伯利亞濱海的遠東邊疆區¹⁴、蒙古、以及華北；由於自從 1911 年中國革命以來，俄國就介入外蒙古，中國的邊疆已經大為改觀，因此不管日本最後選擇哪一個方向擴張，蒙古相對上

¹⁴ 原先是遠東共和國（*Far Eastern Republic*, 1920-22）。

比較重要，當下的重點擺在內蒙古，主要因為這裡與外蒙古、滿洲、及華北接壤；事實上，從滿清末年開始，中國就著手將蒙古裂解、建省、看管，一來可以防止蒙古人團結起來，二來分別以各省的漢人基地蠶食鯨吞；這時候，內蒙古的民族運動主要放在抗拒漢人的墾殖，工作重點在於如何團結蒙古人（Lattimore, 1962b: 427-28）。

在一次大戰期間，日本跟英國結盟，後來又跟美國交好，因此，不太敢採取帝國主義般的擴張，不過，還是透過貸款收買中國軍閥，特別是皖系（安福派）言聽計從，趁著俄國在 1917 年發生革命，利用反漢的蒙古人、反俄的布里亞特人、及反共的哥薩克人，高舉「大蒙古」的大旗，將手伸進滿洲、蒙古、及西伯利亞的交界地帶：首先是抓住博克多汗擔心俄共革命蔓延的心理弱點，支使徐樹錚在 1919 年由南方進軍庫倫掃蕩、取消蒙古自治；接著再採取東方途徑，讓人稱「瘋狂男爵」（Mad Baron）的恩琴（Roman von Ungern-Sternberg）所帶領的白軍擊潰北洋駐軍、幫忙被軟禁的博克多汗復位（Lattimore, 1962a: 59-64）。

在 1911-31 年間，不少蒙古民族運動的領導者身亡，也有一些人逃逸，其他的人則隨著年齡增長變成猶豫不決，許多蒙古人因為感到孤立無援，企盼有人能見義勇為對抗中國，所以，當日本入侵滿洲以後，蒙古人搞不清楚究竟是暫時的干預、還是永久的征服，也就沒有人出面回應；事實上，日本人自己一開頭對於國際輿論也有些顧慮，然而，等到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Lytton Commission）的報告出爐，各國政府混亂、虛偽、犬儒、沒有原則的醜態一覽無遺，日本就放膽展開帝國征服的工作（Lattimore, 1962b: 428）。

既然日本已經掌控主導權，內蒙古失去要求獨立的契機，頂多只能寄望取得某種少數民族保護的安排；當時，日本的蒙古政策制訂操在少數人的手裡，特別是有蒙古經驗的軍官，他們認為可以徵召蒙古人擔任軍事、及政治上的幫手，特別是位於滿洲的東蒙古，宛如帝俄可以充分信任哥薩克人一般；也因此，日本最早的政策是在滿洲國成立某種自治的安排，讓當地的蒙古人不會抗拒、也不會加入抗日游擊隊，要是能讓內蒙古受到感染而心悅誠服，萬一有必要出兵塞外，當

地的蒙古人根本就不用征服就會加入，甚至於讓那些不滿外蒙古著手經濟集體化的人異議份子都有出路，可以長途跋涉前來投靠，進而利用他們將政治民族主義帶回外蒙古（Lattimore, 1962b: 428-29）。

拉鐵摩爾認為，日本的作法是傳統的分而治之策略，也就是離間蒙古與中國之間的矛盾，問題是，接下來是否能夠拉攏蒙古征服中國，就沒有那麼有把握；畢竟，從 13 世紀的蒙古人、到 17 世紀的滿洲人征服中國的經驗來看，歷史的教訓未必能完全挪移套用，因為，目前碰到的最大難題不是征服中國，而是在征服滿洲以後所釋放出來的力量，要如何加以約束而為其所用，同樣地，一旦日軍攻入蒙古、及華北，要如何著手整合，也不是簡單的事，而日本在滿洲西部（東蒙古）、及內蒙古其他地區所碰到的困境，就是最好的例子（Lattimore, 1962b: 430）。

日本在 1932 年於滿洲國成立一個蒙古人自治的興安省，跨越原有的黑龍江、吉林、遼寧、及奉天，大致上符合原有的部落界線，又在 1933 年攻下熱河之後局部納入，只不過，這個自治省是空殼的、並沒有省城，辦公室是設在滿洲國的首都新京（長春）、由中央政府直轄，由此可見，主要的功能是用來號召族人、象徵種族及文化團結，並不希望弄假成真著手政治、或是民族團結；換句話說，實際上的決策者是蒙古人的日本頂頭上司，以確保所有的措施是互利的，也因此，蒙古人不能有自發性的想法，而且，即使對蒙古人有利，也是剛好符合日本利益的副產品；此外，草擬政策的那些少數日本軍人或許打從心理支持蒙古，然而，執行政策的是平民官僚，他們以征服者自居、一副優越感，上下班行禮如儀，既不學蒙古話、也不屑跟蒙古人打交道，甚至於把蒙古人視為野蠻人，更情何以堪的是，除了極少數有名無實的首長，蒙古人只能找到的是屈居於這批人下面的位置（Lattimore, 1962b: 431）。

日本在興安省的經濟控制，由於最高目標是必須符合日本的利益，也讓原本飽受漢人墾殖壓榨的蒙古老百姓大失所望，也就是蒙古民族主義跟日本的經濟剝削無法相容，原本期待的經濟安全、及獨立未能如願；最大的困境是過半的滿洲蒙古人採行農業、已非傳統的游牧，日本人為了有效運銷、及收土地稅，無法把

所有人都納入興安自治區，而是以少數民族身分把他們安置在漢人所支配的省分，由此可見，日本人還是跳不出「政治有用、經濟臣服」的既有窠臼，既然被看破手腳，隨之而來的是幻滅（Lattimore, 1962b: 431-42）。

蒙古人對於日本的敬意，在 1933 年熱河納入興安省之際達到顛峰，此後江河日下，內蒙古的西部開始出現自治運動，特別是內蒙古德穆楚克棟魯普親王（德王）在 1933 年於百靈廟召開自治會議，獲得南京國民政府首肯設置「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1934-36）；當時的背景是鑑於滿洲及熱河的蒙古人錯失良機，未能在透過李頓調查團向世人宣示，除了「滿洲問題」之外，還有一個「蒙古問題」，也就是說，日本不僅侵略中國人的領土、也佔領了蒙古人的土地；雖然噤聲換來恩賜的興安自治省，也因此，滿洲的蒙古人只要針對日本人的政策提出問題，對方就會頤指氣使反問，「到底是誰給你們這個省的？」由於雙手被日本人綁死了，讓他們痛下決心，與其接受日本人的恩寵而人情永遠還不完、倒不如追隨一個真正的蒙古領袖（Lattimore, 1962b: 433）。

德王宣示的基本立場是，「蒙古人是一個民族，有權利決定到底跟中國、還是滿洲國及日本結盟比較有利」，最後選擇跟中國建立親密的關係，理由為同是天涯淪落人，弱者除了聯手對抗日本，想不出還有其他的途徑；然而，中國卻質疑蒙古玩兩面手法、盤算是把自己當作跟日本談判的籌碼，此外，由於內蒙古已經被裂解，表面上為了國家利益，臨疆各省理當配合中央政府充分利用土地、同時安排漢人墾殖以抒解人口壓力，然而在實際上，軍閥莫不視之為禁臠，競相以漢地為大本營大舉入侵省內蒙疆，毫不留情掠奪蒙古人的土地，再逕自以高價轉賣、或是租給漢人墾殖者（Lattimore, 1962b: 434）。

由於內蒙各省漢人主政當局各有盤算，各地蒙古菁英隨人顧生命，德王很難整合內部意見來跟中央政府討價還價，因此，當下的要務不是推動獨立、而是結合各地建立一個蒙古省，如此一來，才有可能至少跟各省平起平坐；事實上，中國如果真的有誠意，理當讓蒙古跟中國地位平等、破除中國與日本宰制蒙古的競爭，然後才有可能將日本孤立為欺負蒙古人的死敵；只不過，南京政府的作法是

把蒙古政策當作牽制各省的工具，相對地，邊省的軍閥則肆無忌憚，不在乎惡行在國際曝光而讓國家蒙羞；在 1934-36 年間，南京政府無力節制各省，頂多只能虛張聲勢，因此，只要山西、綏遠、察哈爾的軍閥願意給點面子，中央的蒙古政策就可以無疾而終，大家都有台階下，至於蒙古人，由於擔心被中國人指控為日本人的走狗，三心兩意、噤若寒蟬，不敢為族人堅持立場據理以爭，這時候，日本人只要冷眼袖手旁觀就夠了（Lattimore, 1962b: 435）。

根據『蒙古自治辦法原則』（1934），中央政府必須撥給經費，而自治政府也可以收稅；由於中央按月撥款補貼，可以視為封口的賄款、任憑內蒙古王公分贓，不過，德王立意將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組織為自治政府，必須另外籌措財源才有辦法開辦，因此打算照章收稅，特別是鴉片駝隊，立即引來綏遠省政府的抗議；德王成功說服察哈爾制衡綏遠，驚覺的南京政府開始冷淡，而綏遠與背後的山西王閻錫山展開反擊，慫恿王公另起自治政府的爐灶，中央政府樂得從善如流，在 1936 年將蒙政會分解為「綏遠省境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綏境蒙政會）、及「察哈爾省境內蒙古各盟旗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察境蒙政會）；最可笑的是，綏境蒙政會的上級指導長官竟是自始阻撓內蒙自治運動的閻錫山，當然是對於德王的無情訕笑，難怪拉鐵摩爾搖頭，德王並非投靠日本人、而是被中國人丟過去的（Lattimore, 1962b: 435-38）。

拉鐵摩爾指出，蒙古在中國、及日本兩大之間難為小，儘管無奈、卻又相當務實，也就是面對日本的擴張，只好跟中國結合：早在 1920 年中期馮玉祥與張作霖交際，內蒙古就有人組織國民黨分部、騎兵還加入北伐，企盼能依據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獲得自治，沒有想到漢人的入壘變本加厲，相對之下，日本西進蒙古也不過是當作進攻華北的踏腳石，而在滿洲國所設置的興安自治省根本就是騙局一場，因此，除了寄望外蒙革命，唯一的選項就是蒙政會下的自治；他認為，德王用心良苦一方面必須駕馭急躁的左派、另一方面又必須鼓舞懶散的右派，有點像是土耳其的凱末爾（Kemal Atatürk）、或是美國的羅斯福（Lattimore, 1962b: 417-19）。日後，國民政府將蒙政會一分為二，德王投靠日本主導蒙古軍政府、

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及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拉鐵摩爾似乎不忍苛責。

拉鐵摩爾日後坦承，他早先不願意講太多，以免他的蒙古友人遭到蔣介石的秘密警察、邊省的軍閥、或是日本人的報復；他回顧當年跟內蒙古人的交往，這些人的看法相當一致，也就是如果有機會北上統一外蒙古，勢必要有日本人提供武器，只不過，要是日本人執意插手，那是異族的入侵，鐵定會激起同仇敵愾、無異逼流亡內蒙古的反政府人士回籠；由於日本進軍內蒙古（1933-36），史達林在 1936 年誓言支持外蒙古捍衛國土，隨即簽訂互助協定、派軍進駐幫忙防邊，日軍不信邪，結果在 1939 年敗於滿洲與蒙古交界的諾門罕戰役（**Battles of Khalkhin Gol**）（Lattimore, 1962a: 133-34）。

外蒙古在國際上的大戰略

拉鐵摩爾在 1949 年替 Gerard M. Friters 的專書《外蒙古及其國際定位》(*Outer Mongolia an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寫了一篇相當長的序〈蒙古在世界的位置〉(Mongolia's Place in the World)，嘗試理解蒙古為何選擇親蘇：他指出，當年美國反對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公開聲明的理由是對其國家、或是政府不太瞭解，這當然是託詞，所以機仗義執言「小題大作」一番(Lattimore, 1949: ix)。他認為，蒙古往往被視為只是被動地跟著中國、及俄羅斯／蘇聯在繞，事實上，不要說兩國不是方程式的常數，譬如中國在 1911 年推翻滿清、或俄羅斯在 1917 年的大革命，蒙古還受到包括美國的其他亞洲強權影響，甚至於，連蒙古本身也因為內部的加速調整而成為變數；**簡而言之，蒙古既然不願意臣服於中國，不可避免必須靠向俄羅斯，問題在於究竟能信任蘇聯到什麼樣的程度(Lattimore, 1962b: 270, 272-73)？**

拉鐵摩爾比較與蘇聯比鄰的三個國家，土耳其、中國、及蒙古。在近東地區，他認為在一次大戰結束以後，由於英國、及法國不樂見俄國革命成功，又不願意看到凱末爾領導的土耳其獨立自主，因此，土耳其與蘇聯的關係是互利；凱末爾合作的對象是地主仕紳、以及新興中產階級，兩者嫌惡外國人透過治外法權享有政治及經濟特權、又痛恨強權以不平等條約制約國家，因此企盼土耳其能獲得徹底的政治革命、及通盤獨立，然而，前者擔憂佃農會以民主多數壓制自己、後者也怕工人的政治權會蔓延經濟權，所以只接受有限的社會革命；蘇聯不希望土耳其被拿來對付自己，希望可以強化土耳其來轉移英、法的壓力，因此，即使本身當時的經濟窘困，還是願意無息貸款從事經濟發展，當然，反蘇聯的強權不得已必須跟凱末爾周旋，土耳其的國際地位就水漲船高(Lattimore, 1962b: 273-74)。

在東亞方面，日本不希望俄羅斯革命成功，而英國、及美國則擔心日本在亞洲大陸過度擴張，因此，蘇聯的目標是希望能轉移反俄的焦點，這時候，中國民族主義者不管左派、右派，判斷跟俄羅斯人的往來或許可以增加跟西方強權

講條件的籌碼；問題是，北洋政府不像凱末爾，並非代表捍衛國家主權的核心，此外，也未必能掌握最精銳的部隊，各地軍閥跟強權眉來眼去，而中產階級與外國人的往來也比較綿密，因此在 1920 年代，蘇聯的基本政策是寧願支持一個有可能上台的民族主義份子、而非國際社會承認的積弱政府；所以，比起其他強權，孫中山得以跟蘇聯著手幾乎是官方的互動；在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已經利用蘇聯的援助削弱西方的控制，轉而投靠後者求援擺脫前者的制約，並且遏制原本應該伴隨軍事及政治革命而來的社會革命；然而，儘管國民政府在 1937-41 年間對蘇聯已經相當不友善、而且明顯親美，卻相對上比較有能力對抗死敵日本，既然彼此有共同的厲害關係，蘇聯表面上是政策失敗，不過還是願意提供大量武器，比美國人還大方（Lattimore, 1962b: 274-75）。

從沙皇到蘇聯，俄羅斯在蒙古的政策大同小異，基本上是當作緩衝地，既不願意加以併吞、也不願意支持獨立，差別在於前者希望蒙古人維持順服就好、後者則期待他們能開始照顧自己；對於蒙古人來說，面對的挑戰並非外國人的殖民控制，而是中國墾殖者對於土地的蠶食鯨吞，也就是說，蒙古的迫切危險不是外國支配、而是流離失所，面對的不是印度人的命運、而是美國印第安人的宿命；其實，外蒙古人早已目睹內蒙古人被驅逐出家園，進入 19 世紀，滿清政府為了方便監控靠近的邊界，開始鼓勵漢人前往外蒙古開發邊地，最豐饒的土地被攫取，族人只好前往貧瘠的草原放牧，王公及寺廟的收益銳減，社會開始現動盪，由滿洲西邊蔓延到外蒙，想要跟中國分離的民族思想跨越階級；不像中國、或是土耳其面對的只是強權的控制，蒙古人面對的威脅是蜂擁而至的中國人，所以根本無法以夷（中國）制夷（蘇聯），至於日本，則因為無法直接跨越人口眾多的中國、長驅直入前來馳援，也就無法取代蘇聯來制衡中國，因此只有零星的個案合作，特別是在內蒙古（Lattimore, 1962b: 276-77）。

衛星國家地位的選擇

拉鐵摩爾指出，現代蒙古的民族主義的發展，主要著眼於如何防止中國官民進入，既然中國、西方國家、或日本並非可行的選項，一開頭就是思考跟沙皇、及蘇聯的外交關係要如何定位，關鍵在於決定彼此究竟要友好到什麼樣的程度；而俄國自始的目標是讓蒙古當緩衝地，只要蒙古人因為積弱而擔心中國的支配，就會接受自己作為保護者的地位，略施小惠、點到為止，只支持自治，並沒有責任逼迫中國讓蒙古獨立¹⁵；因此，自然期待當地社會穩定，選擇合作的對象是保守的封建貴族、及宗教巨頭；所以，面對這種靜態的蒙古民族主義，俄國只要能協助遏止中國勢力進入、而非要將中國國家的權力轉移給蒙古人，當然拒絕幫忙蒙古獨立（Lattimore, 1962b: 277-78; 1962a: 13-14, 51-54）。

拉鐵摩爾早在 1936 年的論文〈內蒙古民族主義黯然失色〉提到，外蒙古的經濟、及社會革命取決於蘇聯的經濟資源挹注，因此可以算是蘇聯的衛星（Lattimore, 1962b: 454）。接著在 1955 年的專書《蒙古的民族主義及革命》（*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Mongolia*），他解析所謂的衛星主義（satellitism），整理了衛星關係的 8 項特徵。他進一步在 1956 年於《西部政治季刊》（*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發表論文〈衛星政治——蒙古原型〉（*Satellite Politics: The Mongolian Prototype*），以蒙古為例，對於「衛星國家」（satellite state）概念做了更完整的論述（Lattimore, 1962b）。儘管通俗的維基百科（Wikipedia, 2020: Satellite state）在相關條目並未引用，他相當自豪是原創者（Lattimore, 1962a: xiv, 155）。

拉鐵摩爾知道，衛星國在冷戰時代是用來描寫被蘇聯支配的國家，包括蒙古、及東歐共產國家，對於西方國家來說，當然是充滿國恥的味道，甚至於就是殖民地、或是傀儡國的同義詞¹⁶，他立意替外蒙古辯護（Lattimore, 1962a: 157）。我們

¹⁵ 譬如博克多汗國在 1911 年成立後，君主博克多汗支持外蒙古與內蒙古統一，不過，他並不知道日俄之間的密約，嘗試尋求日本的奧援遭拒，俄羅斯知悉後強烈反對（Lattimore, 1962a: 53）。

¹⁶ 譬如鮑培認為孫中山、及列寧才是造時勢的英雄，他們分別給中國、及俄羅斯帶來革命，相對之下，蒙古人的民族英雄 Sukebatur 無足輕重，拉鐵摩爾則以為鮑培太瞧不起蒙古人了，彷彿把他們當作任憑蘇聯人在棋盤上擺佈的馬前足，他指出，即使是衛星國家的政治人物，他們選擇當行星軌道上的衛星，還是有機會尋求支配國內部的同情、及支持，不應該視為過於被動、或順

歸納他的基本立論是，即使是兩個國家之間的結盟，只要彼此的政治、或是軍事實力不相當，免不了就有支配國（controlling, ruling, dominant state）與臣屬國（subordinate state）的關係，除了衛星國，林林總總的臣屬國還包括殖民地、保護國（protectorate）、傀儡國（puppet state）、扈從國（client state）、勢力範圍（sphere of influence）、及被支配的盟邦（subordinate ally）。

首先，衛星國是指內政、外交取決於支配國的內政、社會經濟特徵、甚至於生活方式的國家，介於被支配盟邦與保護國之間；保護國或殖民地則是主權受制於人、甚至於完全沒有主權，也就是不能有自主性；至於被支配的盟邦，儘管或許必須放棄些許主權，至少還可以跟大哥討價還價，譬如中國之於蘇聯，而芬蘭、日本、及以色列，他以為分別比較像是蘇聯或是美國的勢力範圍；滿洲是日本的傀儡國，那是世界所公認；根據拉鐵摩爾的文意，我們判斷傀儡國應該是介於殖民地與保護國之間，而扈從國則大致介於傀儡國與衛星國之間。那麼，由納入到被支配的盟邦，可以用光譜的方式來呈現如下（圖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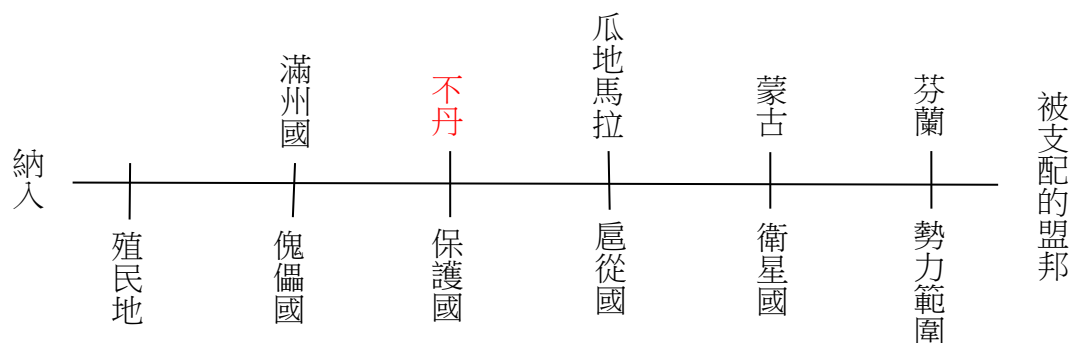


圖 8：國家被支配的地位

拉鐵摩爾指出，殖民地是集體的奴隸，所有土地、及人民都隸屬於他國，而且是可以買賣的，至於支配國之所以不將傀儡國納為殖民地，當然有其特別的考量；不管如何，兩者的共同點就是有些人出於貪婪甘於充當鷹犬，因此是被自己的同胞視為叛徒，當然，大家也知道有些則是被迫臣服，因此不至於被唾棄；此外，兩地的共同特色是民族主義的夢，希望終有一天擺脫支配而獨立，所以，儘

服；他以作為不聽話的衛星國南斯拉夫為例，或許服從是向心的力量，狄托主義（Titoism）卻是衛星關係既有的離心的力量，換句話說，除了言聽計從的「正常」（normal）衛星政治，還是有可能獲得「正統」（orthodox）的異端（deviationist）奧援（Lattimore, 1962b: 301-303）。

管人們為了獲得自治而努力接受殖民教育，有些人甚至於可以出乎意料之外達到異族統治設定的標準，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能有「**差異的權利**」(the right to be different) (Lattimore, 1962b: 296-97, 513)。

相較之下，拉鐵摩爾認為，儘管支配國或許希望臣屬國是自己的衛星國，衛星國卻有兩種可能的盤算：(一) 臣屬國未必只是出於充當支配國的代理人 (agent)，希望能像殖民地、或是傀儡國有「**差異的權利**」就好，也就是終究兩者要分離，而是期待有一天能夠平起平坐，也就是企盼「**有機會相同**」(the opportunity to be the same)，譬如進一步成為聯邦的成員；(二) 也有可能是臣屬國裡頭有少數人擔心被第三國欺負，所以寧願選擇當衛星國，譬如蒙古的心頭大患中國、以及躍躍欲試的日本，那麼，臣服俄羅斯是有利的，或是捷克、及波蘭吃盡德國的苦頭，只好接受蘇聯；換句話說，這是逆向思考 (negative cause)，與其通盤接受不可知的被蘇聯、或是美國支配，倒不如倒退嚕，想辦法周旋於兩強之間 (Lattimore, 1962b: 297-98, 513)。

拉鐵摩爾特別針對戰後移居美國的德裔蘇聯蒙古專家尼古拉·鮑培 (Nicholas Poppe, 1897-1991) 的看法，提出反駁。鮑培主張蒙古自來是中國的屬地，在 1911 年獨立，到了 1924 年改為人民共和國，最後在 1935-36 年降級為衛星國；拉鐵摩爾則認為鮑培忽略了中國及日本的政策對蒙古的影響，同時也沒有看到蒙古內部對於衛星國地位的爭辯：首先，中國在 1911 年之後加速對於蒙古的蠶食鯨吞，而日本在 1930 年代對中國、及蒙古的無情侵犯，蒙古人就必須在俄羅斯人、及中國人之間做選擇，前者毫不隱藏其踐踏的野心，後者的墾殖意味著王公及僧侶壓榨下的土地流失；至於日本人，表面上看起來是比較同情被中國人欺負的蒙古人，終究還是要仰賴既有的政教支配，因此，對於蒙古人來說，當時接受蘇聯的保護是有利的，否則，日軍勢必席捲全境；同樣地，鮑培抨擊蒙古在 1945 年對抗日軍是屈從於蘇聯，拉鐵摩爾也相當不以為然，畢竟，蒙古對日本宣戰大大提高自己在內蒙古、及中國的地位，顯示衛星國至少還是一個國家，不像印度只是仰人鼻息的殖民地 (Lattimore, 1962b: 300-301)。

後記

在韓戰期間，印度提議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以交換撤軍朝鮮半島，然而，蘇聯並不支持。根據肯楠（George F. Kennan）的觀察，蘇聯應該是希望中共在國際上持續孤立、因而必須倚賴自己。擔任杜魯門助理國務卿的魯斯克（Dean Rusk）在 1951 年嘲諷，中共儼然是「蘇聯的滿州國」(Slavic Manchukuo)。盟邦有自己的國家利益考量，很少出於利他主義，難怪把小弟當作傀儡。

要吃蒼蠅必須自己撲 (hop)。當年蒙古宣佈獨立，中國希望繼續滿洲對蒙古的併吞，俄羅斯（蘇聯）則虛與委蛇、只期待當作緩衝地、衛星國，也就是自治就好，後來，當然對於蒙古加入聯合國意興闌珊。這是台灣人的教訓，與其被吞掉、或是當私生子，應該還有自己的選擇，一切操之在我、不要看人臉色。

以前我們罵國民黨，他會說自己比老共好。所以，行政院說當年馬英九政府美牛沒有標準就進口、更應該道歉，聽來似曾相識，好像是在說自己比較沒有那麼爛。如果真的要比較，應該問國會的在野黨有沒有善盡監督的責任、還是虛應故事。同樣地，閣揆說，台豬可以外銷卻不准人家美豬來、說不過去，那也是過度簡化，畢竟，口蹄疫是要觀察二十年，跟瘦肉精在國際上的高度爭議，不能相提並論。說真的，老百姓一定相當納悶，中國人不吃的東西，老美憑什麼要硬塞給我們台灣人？講白一點，那不是趁火打劫、趁人之危嗎？那跟共匪也不過是五十步跟一百步的差別。萬一，他們鬥空白臉黑臉聯合演一齣戲給我們看，怎麼辦？難道大哥是這樣當的嗎？

參考文獻

- 維基百科，2020。〈蒙古歷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蒙古历史>) (2020/7/23)。
- 維基百科，2020。〈內蒙古自治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內蒙古自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8/5)。
- 維基百科，2020。〈中華民國行政區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華民國行政區劃>) (2020/7/23)。
- 維基百科，2020。〈歐文·拉鐵摩爾〉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欧文·拉铁摩尔>) (2020/7/23)。
- Bawden, C. R. 1989.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 Bulag, Uradyn. 2002. *The Mongols at China's Edge: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Unit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Cotton, James. 1989. *Asian Frontier Nationalism: Owen Lattimore and the American Policy Debate*.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 Friters, Gerard M. 1949. *Outer Mongolia an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 Grey, V. 1953. "The Case of Owen Lattimore." *Fourth International*, Vol.14, No.1, pp.18-24 (<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fi/vol14/no01/grey.html>) (2020/8/16)
- Gutman, Alejandro, and Beatriz Avanzati. 2013a. "Altaic Languages." (<http://www.languagesgulper.com/eng/Altaic.html>) (2020/7/23)
- Gutman, Alejandro, and Beatriz Avanzati. 2013b. "Mongolic Languages." (<http://www.languagesgulper.com/eng/Mongolic.html>) (2020/7/23)
- Gutman, Alejandro, and Beatriz Avanzati. 2013c. "Mongolian." (<http://www.languagesgulper.com/eng/Mongolian.html>) (2020/7/23)
- Hansen, Joseph. 1956. "On the Politics of Outer Mongolia." *Fourth International*, Vol.17, No.1, pp.30-33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hansen/1956/xx/mongolia.htm>) (2020/8/16)
- Lattimore, Eleanor Holgate. 1994 (1934). *Turkestan Reunion*.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 Lattimore, Owen. 1930. *High Tartary*.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https://ia800605.us.archive.org/2/items/hightartary0000latt/hightartary0000latt.pdf>) (2020/8/16)
- Lattimore, Owen. 1932.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Macmillan

- Co.
- Lattimore, Owen. 1935 (1934). *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Their Tribal Division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Historical Relations with Manchus and Chinese, and Present Political Problem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https://archive.org/details/in.ernet.dli.2015.79995/page/n7/mode/2up>) (2020/8/16).
- Lattimore, Owen. 1936 (1962b). "The Eclipse of Inner Mongolian Nationalism."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Vol. 33, in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pp. 427-39.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ttimore, Owen. 1936 (1962b). "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Inner Mongolian Nationalism." *Pacific Affairs*, September, in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pp. 440-5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ttimore, Owen. 1947 (1962b). "Inner Asian Frontiers: Chinese and Russian Margins of Expans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7, No. 1, in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pp. 134-59.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ttimore, Owen. 1949. "Introduction: Mongolia's Place in the World," in Gerard M. Friters, *Outer Mongolia an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pp. ix-kliv.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also in Lattimore, 1962b,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pp. 270-9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ttimore, Owen. 1950. *Pivot of Asia: Sinki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 Lattimore, Owen. 1950. *Ordeal by Slander*.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 Lattimore, Owen. 1953 (1962b). "The New Political Geography of Inner Asia."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19, Pt. 1, in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pp. 165-79.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ttimore, Owen. 1955.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Mongolia*. Leiden: E. J. Brill.
- Lattimore, Owen. 1956 (1962b). "Satellite Politics: The Mongolian Prototyp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March, in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pp. 296-303.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ttimore, Owen. 1957 (1962b). "Inner Asian Frontiers: Defensive and Conquest Empir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December 30, in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pp. 501-13.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ttimore, Owen. 1962a. *Nomads and Commissars: Mongolia Revisited*. New

-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ttimore, Owen. 1962b.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roxanarodriguezortiz.files.wordpress.com/2011/08/lattimore_1962-studies-in-frontier-history-collected-papers-1928-1958-by-lattimore-s.pdf) (2020/8/16).
- Lattimore, Owen. 1962c (1940).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2nd ed. Boston: Beacon Press.
- Lattimore, Owen. 1995 (1928).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 Lattimore, Owen. 2006 (1941). *Mongol Journeys*. Varanasi, India: Pilgrims Publishing.
- Liu, Xiaoyuan. 1999, "The Kuomintang and the 'Mongolian Question'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5-1949." *Inner Asia*, Vol. 1, No. 2, pp. 169-94.
- Liu, Xiaoyuan. 2006. *Reins of Liberation An Entangled History of Mongolian Independence, Chinese Territoriality, and Great Power Hegemony, 1911-1950*.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MIASU (Mongolia and Inner Asia Studies Unit), Department of Social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20. "Inner Asia and Recent MIASU Research Sites." (<http://innerasiaresearch.org/new-gallery/>) (2020/7/25)
- Newman, Robert P. 1992. *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erdue, Peter C. 2018. "Owen Lattimore: World Historian." *Oxford Handbooks Online*
(<https://www.oxfordhandbooks.com/view/10.1093/oxfordhb/9780199935369.001.0001/oxfordhb-9780199935369-e-26>) (2020/8/16)
- Rossabi, Morris. 1975. *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PICA Press.
- Sanjdorj, M. 1980. *Manchu Chinese Colonial Rule in Northern Mongol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School of Languages, Cultures and Societies, University of Leeds. 2020a. "Founding Professor Owen Lattimore: Early Life and Career."
(<https://ahc.leeds.ac.uk/east-asian-studies/doc/east-asian-studies-leeds-history/page/2>) (2020/8/16)
- School of Languages, Cultures and Societies, University of Leeds. 2020b. "Founding Professor Owen Lattimore: McCarthy Trials and Time at Leeds."
(<https://ahc.leeds.ac.uk/east-asian-studies/doc/east-asian-studies-leeds-history/page/3>) (2020/8/16)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1996 (1953).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Wikimedia Commons, 2020. “File:Qing Empire circa 1820 EN.sv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Qing_Empire_circa_1820_EN.svg)
(2020/7/25)

Wikipedia. 2020. “History of Mongol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Mongolia) (2020/7/20)

Wikipedia. 2020. “Satellite stat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tellite_state)
(2020/7/20)

Wikipedia. 2020. “Owen Lattimor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wen_Lattimore) (2020/7/20)